

■ 中国文学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 ——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李中华, 陈 鹏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中华(1944-), 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陈 鹏(1978-), 男, 河南周口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摘 要]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 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 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 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 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 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 不是它的焦点, 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 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 文人的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 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关键词] 玄宗朝; 吏治与文学; 盛唐气象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5-0687-07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提出以后, 学术界不时有人对此加以评说, 或然或否, 见解不尽相同。汪篪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一文中提出: 在姚崇用事的期间, 与刘幽求、张说之流互不相容, 其中“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 尽管“他们自己是否已有一种自觉, 现在无从知道, 可是这种冲突, 却一定是存在着的”。汪篪又将此种政争引伸到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 认为李林甫主张选择官员“应凭才识吏干, 不应专用词章”, 而张九龄的看法则是“崇尚文学的观点”^[1] (第196页)。杜晓勤在《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中认为“吏治与文学之争”是一种“极为新颖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随着两派政治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 玄宗朝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2] (第281页)。林继中《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一书解释说: “所谓吏治与文学之争, 事实上是进士科举全面取代汉以来的选举、六朝以来门阀承袭的用人制过程中发生的斗争。”^[3] (第125页) 许道勋、赵克尧在《唐玄宗传》中则提出不同的意见, 该书中说: “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 经再三考虑, 难以接受。如果由此引出吏士派, 似不够确切。”^[4] (第176页)

唐玄宗时期到底是否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 如果存在, 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纷争的历史与文学蕴涵? 它对盛唐气象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 这就是本文试图加以探讨并寻求回答的。

—

唐玄宗在位时期, 朝中始终存在着朋党之争, 史不讳言。其主要表现, 在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

间的明争暗斗,在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在开元后期则有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就历史的声誉而言,姚崇与张说都可以称为开元名相。姚崇历仕三朝又足智多谋,玄宗称赞他“宏略冠时,伟才生代,……有忠臣之操,得贤相之风”^[5](第 236 页)。张说同样文德武功俱备,朝廷诏书中称赞他“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6](第 3056 页)。就人格而言,姚崇、张说也皆有道德风范,俱不失为正人君子。问题是,二人同为玄宗亲信重用之臣,又都不失为正人君子,在朝廷却各为朋党,相互嫉恨倾轧不已。据《资治通鉴》载云:“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7](第 6688 页)姚元之即姚崇。张说因与姚崇交恶,极力阻挠姚崇入相,没有得逞。姚崇拜相后,深受玄宗信任,君臣关系如鱼得水,整理朝政大著成效,然而他与张说的关系依然紧张。姚崇严密地监视着对方的一言一行,等待排斥对方的机会。据史书载云:

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它日,(姚)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张)说左迁相州刺史。^[7](第 6692 页)

姚崇在政治上多谋略,他的一番话便使张说远离政治中枢。与此同时,左仆射刘幽求也失掉宰相之职,罢为太子少保,不久又贬为睦州刺史。在此前后,刑部尚书赵彦昭被贬江州别驾而卒,户部尚书钟绍京左迁绵州刺史,又贬琰川尉,尽削其爵位及实封。朔方道大总管兼御史大夫郭元振以军容不整的罪名,“将斩以徇”,受赦免后流放于新州。这些人都与张说关系亲密,因此在姚崇当政时,他们纷纷遭到贬逐。

又据《明皇杂录》载云: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我不叶,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砬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迨姚既歿,张果至,目其服玩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刻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张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视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抚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8](第 15 页)

《明皇杂录》是晚唐人郑处诲所撰。郑是大和八年(834 年)进士,在朝任工部、刑部侍郎,出为浙东观察使,宣武军节度使等职。该书所记多得之传闻,内容真伪参半,其中说到张说能令姚氏一门“举族无类”,乃是夸张过甚之词。但论姚崇、张说交恶,则应属历史事实。

开元九年(721 年)九月,姚崇病故。同月,张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与姚的朋党之争也因姚崇的亡故而自然结束。

被排挤出朝廷长达 7 年之久的张说又回到玄宗身边,而且大受信任。开元十年仲夏,玄宗有《送张说巡边》诗云:“股肱申教义,戈剑靖要荒。……云台先著美,令日更贻芳。”玄宗视张说为文武兼备的股肱之臣,宠信有加。开元十二年夏四月,玄宗降诏褒扬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6](第 3054 页)这些都是张说将受重用的明白宣示。然而到了开元十四年,张说便受到来自政敌一方的攻击,而且罪名非常严重。据《旧唐书》本传载:御史中丞宇文融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共同奏弹张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于是玄宗降旨鞠问。张说被拘禁于中书省,在接受鞠问期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由于高力士从中斡旋,玄宗产生了怜悯之心,仅仅停兼中书令一职,然而次年便令他退休。

领銜弹劾张说并日益受到玄宗信用的宇文融为人品行不纯,一向为张说所鄙视。当时任中书舍人的张九龄曾提醒张说:“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张说回答是:“此狗鼠辈,焉能为事!”^[6](第 3221 页)然而最终,张说仍免不了栽倒在这些人手中。宇文融后来的下场也不妙,他侥幸登上

相位,仅百日而罢。又因贪污受贿等事被人弹劾,贬昭州平乐尉,又流放岩州,死于途中。

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张说去世。张九龄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与祭文,痛惜“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坠司南,文殒宗匠”,对于张说的道德、文章、功业、学识及历史地位作出了全面崇高的评价。《旧唐书》载云:“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张)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张)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寻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6](第3099页)张九龄全面继承了张说的地位,担起政坛、文苑领袖的角色。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斗争亦由隐而显,逐渐上升为朝廷主要的斗争。

李林甫出身王室,为人阴柔乖巧,心机城府深密,尤善于利用关系依附攀援,以求得升迁固宠。史书形容他“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又说他“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6](第3236页)。概而言之,李林甫为官固宠的诀窍是伺探消息、迎合上意、厚自结托、投其欢心。待人表面上甜言蜜语,暗中排斥异己,培植私党势力,人称口蜜腹剑。

张九龄为人忠直耿概、风度清华,而李林甫则虚伪狡诈、不学无术;张九龄在玄宗面前遇事力争,忠言谏诤,而李林甫伺察逢迎,先意承旨。在皇权专制下,其结果可想而知。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次年四月,出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因病去世。李林甫则秉持朝钧20年,使得玄宗朝政治迅速滑向昏暗、腐朽、无序,终于酿成亿万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

二

上述玄宗不同时期的朋党之争,其内涵随时有所变化,并不完全相同。大致而言,姚崇与张说之间的党争是由于政见与意气相左而形成,双方皆有过失,又皆不失为正人君子。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的党争有着治国理念的差异(一重文学教化,一重财政赋税),演为权势的倾轧。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党争,则有着政治是非、道德善恶、人格尊卑之别。

在这种朋党角逐中,便包含用吏治与用文学之争。所谓“用吏治”,是说在任用官员时要着重其实际经验与政绩;所谓“用文学”,是说在任用官员时要着重其学术素养与文章才华。这种用人标准上的吏治与文学之争有着复杂的背景:其一,是由于武后朝政治失序,朝廷鼓励告密、重用酷吏,朝廷官员呈现人人自危的局面,而侥幸者依附谄媚、苟且躁进,造成官员队伍普遍的人格扭曲与道德失落;其二,中宗朝官员队伍迅速膨胀,品流杂滥,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斜封官”。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各公主皆开府,“官属尤滥,皆出屠贩,纳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9](第3654页)。另据《旧唐书》载左补阙辛替否疏云:“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余户。”^[6](第3159页)可知这种斜封官当时有数千员之多。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朝廷应按照什么标准选择任用官员。

从一般的意义说,用吏治与用文学并无根本的冲突。政治非止一途,吏治之士与文学之士本可以并行不悖,各展其才,互为补充。然而在封建体制之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其中显要职位更是屈指可数。君心独断,朝臣争宠,朋党便有了滋生的土壤。官员职务有所倚重、性格各有差异,在用人上有所偏重是难免的。姚崇被称为“救时之相”(《唐语林·品藻》),他先后三度为相,皆兼兵部,千头万绪的事务等着他去处理,对于从事实务的官员较为熟悉,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在处理繁剧急迫的军国政务中,他对于文士的迂腐不切实际感受尤深。而张说虽然有实际经营干练之才,但是他的主要功绩作用还是在礼乐文章方面。据《新唐书》载云:“(苏)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9](第4402页)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十一年五月,“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史鼓城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7](第6756页)开元十三年,玄宗又召张说等文学之士,赐宴于集仙殿,对张说道,“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名为集贤殿。”玄宗还曾经在彩笺上以八分书写《张说赞》曰:“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

发,翰苑光鲜。”^[10](第 129 页)可以想见当时君臣相得、诗酒风流的境况。

张说、张九龄先后成为当时文人参政的楷模,又是当时文坛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们的文采风流,由于君王的赏识而更加焕发光彩,对于广大文士无疑会产生表率的作用。在这种朝廷格局中,文学之士得到较多进身的机遇,是很自然的事情。相形之下,对立派的官员宇文融、崔隐甫、李林甫、牛仙客等则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宇文融出身官僚家庭,崔隐甫为官刚直严厉,他们在经济管理、财政赋税上也许有干练之才,文学上则几无表现。李林甫深于权谋,却并无学术,《旧唐书·张九龄传》称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他的心计才能全用在阴谋暗算上。牛仙客久习吏事,谈不上文学表现,《资治通鉴》载张九龄曰:“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史载李林甫还曾引用萧灵为户部侍郎,萧灵某次读《礼记》“伏腊”为“伏猎”,因而受到文学之士严挺之嘲笑,李林甫为此而深恨之^[6](第 3105 页)。严挺之与张九龄相善,而萧灵与李林甫同调。可知在当时,文学与吏治之士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的情绪,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大唐新语》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10](第 10 页)在用人上,张说偏向于文学之士。与之相反,李林甫向玄宗推荐牛仙客时说:“但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7](第 6823 页)张说、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这自然容易引出朝政的纷争。

三

用吏治与用文学是当时朋党之争的表现形态,已如上所述。然而,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这可以从其代表人物自身的情况来作初步的说明。

被奉为吏治派领袖的姚崇,其实也具有文学之士的身分,他起初是应“下笔成章举”考试而授濮州司库,五迁夏官郎中。他后来历仕三朝宰相,处理军政功绩卓著,然而这不等于他鄙视文学,更不能说他缺少文学才能。宋人记载说他“时有述作,然少见于世”^[11](第 223 页)。《文苑英华》录其作品七首,其中诗四首,赋、书、诫各一首。又张九龄有《和姚令公哭李尚书^墓》、《和姚令公从幸温汤喜雪》,今姚作并亡,可知姚崇诗文散失甚多。

与姚崇矛盾相对的张说也绝不是简单的文学之士。张说参与了玄宗诛灭太平公主的权力斗争,在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节度使时,曾带领轻骑 20 人,深入降虏部落,又曾统率马步兵 20 万破敌,安定边疆,继而奏章朝廷减边防驻兵 20 万,表现了非凡的政治胆识与才干。张九龄为人善恶分明,居朝守正不阿,在玄宗面前极言得失,谔谔有大臣之节。他审讯刑案,判决公允,囚犯轻重皆服,当时称为“张公口案”(《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他早就看出安禄山有野心,主张“因罪戮之,冀绝后患”^[10](第 12 页)。唐玄宗誉之为“正大厦者,柱石之功;昌帝业者,辅相之臣”^[10](第 12 页)。上述这些皆非“文学”二字所可包含。

其实用吏治与用文学只是一个大概的倾向,远非水火对立、泾渭分明。姚崇被认为是吏治派的领袖,然而他推荐代替自己的宋璟,却是“博学,工于文翰”^[6](第 3029 页)。姚崇曾经上表朝廷请求奖励刘知几、吴兢,又曾引用严挺之,刘、吴、严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同时姚崇与张九龄关系也不错,二人不仅有书信往来,还有诗章唱和。张说还奉玄宗之命撰写姚崇的神道碑,碑文中赞美姚氏“武库则矛戟森然,文房则礼乐尽在”、“学习攢植,文锋迅驱”,又说世人“但睹浑璞,谁详瑾瑜”^[5](第 2327 页)。可知两人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样对立。

大体而言,特定朋党的产生与盛衰,首先由于封建政治的激发,而以君心为转移。开元前期,稳固政权、安定社会为亟务,姚崇因而深得玄宗的信任。到开元中期,玄宗掌权日久,敷陈文教、润色鸿业渐次提上日程,张说、张九龄便先后受到赏识,升至辅臣的地位。玄宗朝在文化上采取开明、开放的政策,而在政治上则是绝对的专制。所谓朋党,只能适应专制者的需求而产生,顺从皇权意志而存在,同时又随

着君心的反复而兴衰。玄宗不仅主宰着朝局运行的方向,而且掌控着最高人事的任免,他在一念之间可决定朋党首领的生死。史载姚崇断中书主书赵诲一案不合意旨,玄宗不悦,姚崇“自是忧惧,频面陈避相位”^[6](第3025页),又右丞相兼中书令张说被诬与术士交往及受贿等状,玄宗敕令宰臣、刑部尚书、大理少卿、御史大夫等共同鞠问。用吏治与用文学的轻重,与其说是由于朝臣政见的不同,不如说是体现着独裁者个人意志的转移。

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时常表现着暴戾、非理性的品格。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周子谅被杀一案,便是专制政体下独裁者毒焰凶残的大暴露。周子谅是朝廷的监察御史,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忤旨,擻之殿庭,朝堂决杖死之。”《旧唐书·李林甫传》则载云:“监察御史周子谅言(牛)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资治通鉴》记载稍详,说:“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讖书为证。上怒,命左右擻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_驩州,至蓝田而死。”^[7](第6827页)李林甫再进谗言说张九龄曾荐引周子谅,张九龄也因此遭到贬逐。正是由于独裁者的个人意志不受限制,直接导致了王朝的动乱与衰败。

在考察“吏治与文学之争”时,离开封建专制君主的主宰作用而谈论具体的是非,这必然模糊了它的本质。

四

玄宗朝隐然存在的这场用吏治与用文学之争,对于当时文坛作家的创作与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可以分为三个类属作分析:一是文坛领袖人物张说、张九龄,朋党之争与他们的贬逐生涯密切相关;二是诗坛名家王翰、王维,他们因朋党之争而牵连被贬,朝政的昏暗浇灭了他们从政的热情;三是对于李白、杜甫、元结来说,开元之治激发了他们的政治抱负,而李林甫的专权则使得他们的人生旅程充满了险阻和辛酸。

开元三年,张说受姚崇排斥出为相州刺史,转任岳州刺史,开元七年校检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节度使,开元九年九月又重新入朝。这七年外放、贬谪的岁月,使得张说的诗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新唐书》本传称张说既谪岳州,“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他在幽州、并州的诗作则浸润了苍老悲壮、慷慨许国的气概。与之相近似,张九龄被贬逐荆州时,年纪已达60。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在寄寓忧伤的同时也彰显着坚守气节的高尚人格,从而在清婉中更注入了一份馨香。

在开元诗人中,王翰性格放荡不羁,率性而为,迹近豪侠。他多次得到张说的荐引,是张说周围重要的文士之一。张说罢相后,他也遭受贬谪,最后死于道州司马任上。另一位著名诗人王维则受到张九龄的赏识,被擢为右拾遗。王维曾向张九龄献诗,赞颂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在张九龄罢相外放后,王维又有《寄荆州张丞相》诗,写道:“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张九龄的遭贬使王维的人生态度发生重大的转折,他因此而对政治感到失望,趋于消沉退避,渴望隐逸。

玄宗朝党争对于李白、杜甫、元结等人的影响是间接的,但仍有迹可寻。开元十三年,李白出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正是张说执掌集贤院事时,因此李白怀抱“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故林”的济世梦想,很难说不是受到玄宗宠遇文士、大张风雅的现实激发。开元十八年夏,李白首次来到长安,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中说:“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觴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卫尉张卿即驸马都尉张_说,他是张说的次子。李白希望得到张说的汲引,实现经纶天下的理想,其意十分明确。然而此时张说已是重病在身(不足半年即去世),张_说亦无见识,李白的期望只能落空。天宝元年秋,李白二入长安,待诏翰林,历时不到三年,便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李白在长安期间的具体活动,如今虽然难知其详,但其政治倾向大体可以推测。当时与李白关系亲密、相互交游的友人,如李适之(“饮中八仙”之一),天宝元年(742年)为左相,因受李林甫阴谋陷害,天宝五载罢知政事,贬宜春太守,天宝六载,被逼仰药而死。又如李邕,天宝初任北海郡太守,亦为李白所仰慕,李白诗中多次提到他。天宝六载,李邕被李林甫派人杖杀。又如崔成甫侍御,长期与李白交往,关系非常

亲密,天宝五载亦因事被贬。综上所述,李白对于朝政的立场与态度都与专擅朝政的李林甫相对立,这一点十分清楚。李白再次来到长安,最终无功而返,应当与他的这种政治立场与态度有着绝大的关系。

天宝六载,就在李邕、李适之等人被迫害至死的同时,在李林甫的操纵下,朝廷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科考,以选拔人才。杜甫、元结都参加了这场考试,结果是“无一人及第者,(李)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7](第 6876 页)。这件事对于杜甫心灵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天宝十载,杜甫向朝廷献《三大礼赋》,受到玄宗的关注,使待制集贤院,命试文章,然而他从政的希望再次遭受到李林甫的压抑。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写道:“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里的“前政”即指李林甫,“阴谋”、“忌刻”是说李林甫对士人的手段阴狠刻薄。仇注曰:“‘破胆’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阴谋’、‘忌刻’四字,极尽奸邪情状。”^[12](第 143 页)元结的遭遇处境与杜甫有相似处,不必赘述。

玄宗朝文人受压抑、遭迫害的状况,不难想见。这种局面,势必对盛唐诗坛的内在气运与宏观风貌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为“盛唐体”^[13](第 53 页)。他又说:“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3](第 253 页)此后,学者纷纷以“盛唐之音”、“盛唐气象”评论这一时期的诗歌。这些评论一致地肯定盛唐诗歌最鲜明的美学风貌:真率活泼的精神,蓬勃壮大的气势,遒劲飘逸的旋律,潇洒隽永的兴象。这些,无疑道出了盛唐诗歌给予后人最突出的心灵感受,是盛唐诗有别于其他时期诗歌的重要特色。

然而,通过对开元、天宝党争局面的考察,便会发现“盛唐之音”、“盛唐气象”之下有着更为丰厚、复杂的内蕴。开元、天宝年间,朝廷政治由清明转向昏暗,社会由兴盛的顶峰迅速滑向动乱的深渊。与之相对应,“盛唐诸公”的人生旅程中也充满了挫折与苦难。因此,“盛唐之音”中所寄寓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盛唐之音”展现了在一个开放、强盛的国度里,文人以报国自许、以才华自命、以功业自期的人生理想由树立至幻灭的完整过程。“盛唐气象”则是这一过程中文学、艺术美的显现。“盛唐之音”宛如一座雄深的山峦,“盛唐气象”则是笼罩其上的烟树与云霞。

因此,在张说的笔下,既有“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如此兴象丰茂之句,也有“古木无生意,寒云若死灰”这种意趣衰飒之词;在张九龄的笔下,既有“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的高华境界,也有“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的复杂心声;在王维的笔下,既有“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的慷慨心声,也有“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的隐逸之思;在李白的笔下,既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种充满自信的宣示,更有“孔圣犹闻伤麟凤,董龙更是何鸡狗”这种愤懑之语;在杜甫的笔下,既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更有“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凄凉叹息。在盛唐诗人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玄宗朝党争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其中“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其表象之一端。它对盛唐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张说、张九龄先后受到唐玄宗的信任,成为辅佐之臣,这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从政理想,为文人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了生动的榜样。经世济邦、建功立业与文采翰墨、诗酒风流相结合,成为盛唐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诗苑盛唐诸公笔下多带激情与亮色,皆与此有关。其二、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一切以君王的私心为转移,权势成为催生邪恶与腐败的温床。玄宗朝后期,政治转向昏暗,文人从政之途荆棘密布,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这更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参 考 文 献]

- [1] 汪 ．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A]．汪 隋唐史论稿[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2] 杜晓勤.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 [3] 林继中. 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 [4] 许道勋,赵克尧. 唐玄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 董 诰. 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刘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8] 郑处海. 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9] 欧阳修.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 刘 肃. 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1] 计有功. 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2] 仇兆鳌. 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3]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责任编辑 何坤翁)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itical Factions of Administration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Tangxuanzong

LI Zhong-hua, CHEN P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I Zhong-hua (1944-),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HEN Peng (1978-),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Sui, Tang, Wudai dynasties.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whether there li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itical factions of Administration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Xuanzong. The major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flict was the strife between YAO Chong and ZHANG Yue in the earlier years of Kaiyuan Period, between ZHANG Yue and YUWEN Rong, CUI Yin-fu in the middle years of Kaiyuan Period, between ZHANG Jiu-ling and LI Lin-fu in the later years of Kaiyuan Period. The conflict was no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lique struggle, nor its focus, still less its essence, but rather its surface. The game of power, the emperor's will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clique were the root and essence of the conflict. The conflict worse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Kaiyuan and Tianbao Period and made the literati's life filled with frustration and tribulation,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coming of the atmosphere of High Tang Dynasty.

Key words: period of Emperor Tangxuanzong;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itical factions of administration and literature; atmosphere of High Tang Dynasty